

月11日埃及革命的成功意味着这一铁律已经被打破。拥有古老历史、阿拉伯人传统和伊斯兰教的埃及爆发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并将开始向阿拉伯世界真正有代表性的民主过渡。单这一点,就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埃及革命并不是孤立的。同为阿拉伯国家的突尼斯在2011年1月所爆发的动荡,驱逐了本·阿里总统;目前的群众革命还在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蔓延。埃及革命的成功,究竟会如何影响和改变传统君主集权或者强人专制的阿拉伯世界,目前还难以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埃及革命将把世界穆斯林推上全球“第四波民主化”进程。

1993年,亨廷顿教授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提出,世界各主要历史文明区域将成为未来冲突的来源,其理由之一是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世界无法融入世界主流的文明进程。然而,中东动荡宣告中东阿拉伯国家开始走出宗教和传统束缚,由人民的意志来书写历史新篇章。在中东动荡面前,“文明冲突论”已经失去了其实证基础。

其次,中东动荡是中东地区和穆斯林势力在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觉醒,其世界政治的含义虽然无法比拟1991年冷战的结束,但其影响显然将超越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超越中东,注定将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新的标志性事件。

全世界穆斯林总人口约有12亿,分布在52个国家。这其中并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埃及是全球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如果埃及革命所引发的阿拉伯民主进程不断深化,全球穆斯林世界中若干有代表性的民主国家或许也将从此迈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版

图将重新改写。从这两个意义上说,“埃及革命”最终的世界历史意义,可能并不取决于2月11日开罗街头胜利的埃及人喜笑颜开的欢悦,而是取决于未来的埃及、未来的阿拉伯世界能否真正跻身世界主流浪潮,将民主进步的成果转化为经济发达、社会富裕的甜美酒浆。

第三,中东地区可以预见到的持续动荡将给欧美在中东的原有战略利益和战略架构带来重大冲击。特别是由此而可能产生的持续高油价、加速流出的北非和西亚难民、未来以巴和平的新形势以及伊朗在中东的战略地位等不确定性,有可能不仅拖累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加大全球通胀压力,也可能迫使在中东地区占据战略主导地位的美国不得不重新评估其中东战略,修改其中东战略的传统重点。

奥巴马政府在中东动荡中的应对策略可以说“调整迅速、务实面对”,从原来的支持穆巴拉克这样传统的亲美力量快速转向支持中东地区民众的政治诉求,抛弃和施压于卡扎菲政权,全力维护美国在中东保持驻军、同草根穆斯林势力和解以及中东第一区域外影响力大国地位等诸多关键性战略利益,以便尽可能减少中东动荡对美国中东战略的危害。但未来中东局势究竟如何演化,目前尚难断定。如果美国未来能够影响埃及等国的政治重建进程,维持亲美势力的“基本盘”,那么中东动荡可能成为美国在“9·11事件”及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中东战略利益重新得以巩固和发展的新开始;如果埃及、突尼斯和中东地区未来政局更多地受到极端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影响,社会动荡持续,那么中东格局的“重新洗牌”无疑将增加美战略包袱。○

中东剧变塑造“新中东”

唐志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这次中东剧变凸显“旧中东”已不可持续、大势已去,而“新中东”呼之欲出。之所以说其“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相对稳定的传统中东政治

局面被打破,中东进入一个变革与政局动荡的新历史周期。当前由突尼斯剧变所引发的“骨牌效应”仍在发酵、蔓延,几乎波及所有地区国家,整个中东

处于深度震荡之中。目前看,这场剧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当前正处于第一阶段,即“革命”阶段,其目标是让现政权最高领导人下台,预计这一阶段将持续半年到一年时间。随之将进入第二阶段,即“变革”阶段,可以称之为这场“革命”的“第二波”,它的主要诉求和特征是变革,要求深化政治改革,这可能是一个长期进程。从土耳其、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民主转型的历史看,这种政治转型往往需要少则10年,长达数十年时间。无论是“革命”阶段,还是“变革”阶段,剧烈的政局动荡以及地区不稳定恐将伴随始终。

第二,中东剧变凸显中东传统统治模式已不可维持,改革势在必行。当前中东是全球君主制、家族式统治和强人政权最为集中的地区,正是这一点成为引发本次地区性革命风潮的主要原因。在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相继倒台、卡扎菲政权摇摇欲坠后,基本国情、面临问题颇为相似的阿拉伯国家恐已再无任何侥幸心理,家族世袭制、总统终身制面临严峻挑战,甚至可能走向终结的命运。也门总统萨利赫、苏丹总统巴希尔均已承诺任期结束后不再连任。君主制国家,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绝对王权制国家,也都提出了“限制王权”口号。

第三,从剧变性质看,也预示着“新中东”可能到来。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会启动后,以色列总理佩雷斯曾提出“新中东”概念,但这一概念仅限于和平与安全方面,指的是阿以两大民族实现历史性和解。二战后,阿拉伯世界先后爆发了两次大规模革命浪潮:第一次为50年代以埃及“纳赛尔革命”为标志的民族主义革命,第二次则为本次由突尼斯剧变所引发的地区性反政府抗议风潮。这两次革命浪潮都是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深层危机做出的反应,前者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赶走了英法殖民者,推翻了封建王朝;后者则具明显的民主主义性质,旨在扩大民主、实现社会公正和改善民生。

但是,“新中东”的最终形成及其走向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进程,取决于诸多政治行为体的角逐。这其中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传统的国家行为体,也有非传统的非国家行为体。从非国家行为体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三大非国家行为体的

角逐:以中产阶级、公民组织和青年为代表的民主主义力量、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势力以及军方。现在看,民主主义不可避免地取代传统家族统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议会民主制将逐步确立,现代公民意识普及、民主自由扩大不可阻挡,“阿拉伯英雄”时代行将结束;虽然未来世俗化体制仍将是主流,但在诸多长期对政治伊斯兰势力持高压政策的强人政权相继垮台或被削弱后,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将不可避免,中东政治生态将进一步“绿化”,而世俗与宗教之争恐将占据阿拉伯国家政治议程的重要位置。

从军队作用看,由于二战后阿拉伯世界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数十年来军方一直在该地区国际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引人注目的角色,近期在突尼斯、埃及政权更迭中军方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以及各方对军方发挥维稳、维护世俗体制的需求,都预示军队在未来中东政治生态中仍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土耳其模式”可能成为一个重要参照。此外,传统的部族力量也可能崭露头角,成为重要政治力量,如在利比亚、也门、阿尔及利亚、阿曼和沙特等国。

从地区国家行为体看,阿拉伯国家、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在这场中东变局以及如何塑造“新中东”中将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至关重要。这次中东剧变使既有中东地缘战略格局受到严重冲击,打破了原有地缘政治力量平衡。首先,阿拉伯世界再遭重大危机。今后,阿拉伯世界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忙于自救,短期内地区作用下降。但是,危机是“危”,也是“机”。从长远看,阿拉伯世界也可能凤凰涅槃,有着“重生”和复兴的希望。其次,伊朗成为最大受益者。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反伊阵营面临瓦解,伊地区性盟友如伊斯兰势力、什叶派力量将增大,美短期内无精力对付伊朗,伊地缘政治环境将大幅改善,迎来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的“第二次机遇”。第三,以色列安全环境恶化,中东和平进程恐夭折。埃及和约旦是阿拉伯世界仅有的两个与以建交并签署和约的国家。“埃以和约”是以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支柱,穆巴拉克下台使以失去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盟友,埃以关系由亲变疏似难避免,埃未来

新政府很难再助美、以,压制哈马斯。此外,以宿敌伊朗坐大,埃伊关系面临改善,哈马斯与真主党获得发展新机会,使得以战略安全环境恶化。伊朗军舰通过苏伊士运河,已折射出未来以色列危局。未来以色列恐将再次整军备战,无心和谈,巴以重返冲突,阿以冲突风险增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在当前乱局下“不可能盲目签署和约”。第四,土耳其在中东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近年来土远离西方,加

大“东向”(亚太)“南下”(中东)力度,影响力大幅提升。中东变局将使土“南下”决心增大,进一步扩大地区作用。

从外部看,世界大国,尤其是长期主导中东的美国以及中东邻近的欧盟如何看待这场变局,以及将如何引导这场革命、以何种方式和何种理念塑造新中东,也引人注目。○

中东稳定是中国战略利益所在

马小军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从突尼斯倒下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中东乱局仍在向纵深延伸,至今看不出个端倪。国际与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交织纠结,加之原本复杂深刻的历史、民族、宗教、文化和地缘政治背景,使得无论是大国抑或是当事国的政客、媒体,甚至是专家学者,就像无人事先预料到事件的突发那样,不但无法进一步分析出令人信服的事件可能的发展趋向,甚至连事件发生的背景和缘由也缺乏条分缕析的说明。自然,其中更凸显了中国政学两界对当下这一热点国际政治话题的生分及分析研判的力不从心。

坊间论者多将此次中东突变与后冷战时期分别发生于 1991 年的海湾战争和 2001 年的“9·11 事件”加以排比,笔者认为,那只是着眼于它的现实地缘政治效应而言的;若将视野和时段放得更为宏远些加以研判,则笔者毋宁将其与 20 年前的那次苏东剧变相比较。此次中东事变发生速率之快、各国事变方式之雷同、多米诺效应之彰显,均堪比苏东剧变。事变的进程至今尚在向更为广阔和深刻的空间延烧,从北非各个多年为政治强人统治的共和体制国家,蔓延到了沙特及海湾诸君主体制的重要产油国家,即使起初作壁上观并希冀适时火中取栗的伊朗,似也未能幸免。认真观察此次中东事变的种种细节,其间各种国内政治力量消长的纠结繁复,各方国际政治因素博弈的扑朔迷离,让人们一时难于找

出事件的“元凶”或通常的“幕后黑手”。国际社会相关各方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知所措,处置手法犹豫踟蹰,犹恐一旦因研判失误而处置不当,会使自身战略利益受损。尽管我们迄今仍无法对事态的后续发展特别是中东新的国际政治格局重建清理出一个大致思路,但可以预见的是,此次中东发生的事变将极大地改变现有中东政治版图,不仅将使中东而且将使整个国际政治格局为之发生深刻变化。笔者以为,若将视野放得更为长远些,这种变化将推动整个伊斯兰板块与西方及其他国际政治板块之间的战略关系发生本质性调整。就此而言,我们将此次中东突发的事变称之为剧变,似乎是恰当的。

此次中东一系列强权的接踵倒台和政治强人的纷纷落马,似乎再次道出了一个看似浅显的规律:政权更迭不过是现代公民社会一种日常的政治自然规律,而此次中东事件的意义只是在于提示人们,中东的强人政治正在远去。目前,对无论是埃及、突尼斯、也门,抑或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强人政治做出历史性总结,都尚嫌过早。尽管这些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中东强人政治家们也曾对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过种种无法抹去的重大贡献,也曾对本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甚或中东和平大局的塑造发挥过积极影响,但终身制下的强人(老人)政治,必然催生家族统治、裙带政治、腐败和专制,缺乏制约的